

---

# 梁安郡历史与王氏家族

廖大珂

---

一

《续高僧传·拘那陀罗传》记载，印度西北优禅尼国僧人拘那陀罗，又名真谛，曾泛大海于梁大同元年（546年）抵南海（今广州），两年后抵建康（今南京），因侯景之乱，不能安居，自承圣三年（554年）后辗转播迁于今江西、广东等地。陈永定二年（558年）到达福建的晋安郡（治所即今福州），“又泛小船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继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循人事，权止海隅……至（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sup>〔1〕</sup>

此“梁安郡”位于今福州与广州之间，当时有大舶通印度，可见是南朝重要的对外交通港口，但是有关的正史《地理志》对它的记载却付诸阙如，因此长期以来关于梁安郡港口的地理位置显得扑朔迷离，史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1983年章巽先生发表《真谛传中之梁安郡》一文，<sup>〔2〕</sup>对梁安郡的今地作了精辟的考证，将其确定在今南安县丰州，该问题算是有了定论，其功不可没焉。然而，章巽先生对梁安郡设置年代和历史的考证却有值得商榷之处。

二

关于梁安郡的始置年代，章先生未加具体说明，只说“梁安郡存在的时间，应该是从梁代天监（公元502—519年）年间到陈代天嘉五年（公元562年）这段时间。天嘉五

年年底陈朝平定今福建地方,以后不久当即改称梁安郡为南安郡了”;至隋代又改名南安县。是否如此?

根据唐初杨炯撰《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所记,“公讳义童,字元稚,其先琅琊临沂人也……祖僧兴,齐会稽令梁安郡守南安县开国侯,禄位千石,珪符王等,营室迺于羽仪,山河入于盟誓。父方畚,梁正阁主簿伏波将军梁安郡守,隋上仪同三司,以惠和之德,有文武之才……武德四年(621年),诏公为江南道招讨使……诏除泉州都督,封建昌县男,食邑三百户……境接东瓠,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玢。”<sup>[3]</sup>按,碑文中王义童之父王方畚无疑即《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中的梁安郡太守王方奢,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亦作王方畚,应以碑文为正。

从上碑文可证,1、梁安郡治所确在今南安县;2、梁安郡在齐代已存在,并非始建于梁代,换言之,在梁朝代齐之前已有梁安郡之设;3、南安县齐时已有其名,梁时废焉,非隋代才改称。

梁安郡究竟始置哪一年?郡在齐代即名梁安,王僧兴又封“开国侯”,这是怎么一回事?笔者认为,梁安郡的设置和王僧兴封“开国侯”与肖梁代齐有密切之关系。

南齐末年,齐帝肖宝卷实行暴政,又大肆诛戮大臣,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永明二年(500年),齐雍州刺史肖衍起兵于襄阳,翌年另立肖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改元中兴。不久,肖衍率军攻入齐都建康,杀肖宝卷,掌握了南齐政权。中兴二年(502年),肖衍受齐禅,该年四月即皇帝位于建康,改年号为天监,正式建立梁朝,这就是梁武帝。

但是梁“建国”,实际上要早于天监改元。肖衍控制南齐政权之后,于中兴二年二月进位相国,总百揆,进封梁公(后又加封为梁王),此被视为梁的“开国”,故齐宣德皇后诏书云:“梁国初建,宜须综理,可依旧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sup>[4]</sup>大概是在此时,肖衍以齐朝的名义,析晋安郡晋安县置梁安郡,并改县名为南安县,王僧兴被任为齐朝的梁安郡太守,封“开国侯”。所以梁安郡的始置年代当在齐中兴二年二月,而不是梁天监中(502—509年),否则的话,在《王义童神道碑》中,王僧兴就不能被称作“齐梁安郡守”,而应该是“梁梁安郡守”了。其实,当肖衍的梁国初建,“依天朝之制”,“选诸要职”,被封为“开国侯”者岂止是王僧兴一人,如南齐的尚书右仆射王亮,“梁台建,授侍中,尚书令,固让不拜,乃为侍中,中书监,兼尚书令”,封“开国侯”;及“高祖(肖衍)受禅,迁侍中,尚书令,中军将军,引参佐命,封豫宁县公邑二千户”。<sup>[5]</sup>齐吏部尚书王志,“梁台建,迁散骑常侍,中书令,右军将军”,<sup>[6]</sup>亦封“开国侯”。<sup>[7]</sup>所谓“梁台建”,即指肖衍进封梁公之事,王僧兴与王亮、王志等人应是同时授官封侯。据此,梁安郡的设置亦必在此时。总之,梁安郡的设置是在南齐末年,而不在梁朝,至于梁安郡于陈代改名南安郡,章巽先生的文章已有精辟之见,兹不赘言。

## 三

关于琅琊王氏家族与海外交通。根据《王义童神道碑》，王义童“其先琅琊临沂人也”，即为山东琅琊仕族王氏的后裔。

琅琊王氏自曹魏之后，位望日隆，公卿辈出，为关东显赫的世家大族。西晋司马佃（司马懿之子）徙封琅琊王，即与王氏交相结托，以争取关东仕族的支持。永嘉之际，晋室与北方仕族南渡，司马佃之孙、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兄弟的辅佐下，建立东晋王朝，从此王氏与皇权相结合，其权势益加煊赫，有如日中天，时人为之语：“王与马，共天下。”<sup>〔8〕</sup>尽管南朝政权频繁更迭，但是无论是谁做皇帝，都必须以高官重位来笼络王氏，换取其支持，巩固皇位。于是王氏凭藉世资，依然冠冕盛门。如王导的曾孙王弘在刘宋时，“进位太保，领中书监”；<sup>〔9〕</sup>王弘弟王昙首，“领右卫将军，领骠骑将军”；<sup>〔10〕</sup>王弘子王僧达，官至“中书令”；<sup>〔11〕</sup>王昙首子王僧绰，官至“吏部尚书”；<sup>〔12〕</sup>王僧绰子王俭，刘宋朝为“吏部郎”，及“齐台建，迁右仆射，领吏部”；<sup>〔13〕</sup>王僧绰弟王僧虔，刘宋末为“尚书令”，肖齐代宋又“授左光禄大夫、侍中尹”；<sup>〔14〕</sup>王僧达孙王融，南齐时“自恃人地，三十（岁）内望为公辅”；<sup>〔15〕</sup>王僧虔子王慈，亦官至“冠军将军，庐陵王内军长史”；<sup>〔16〕</sup>王氏家族地位之优越于此可见一斑。

鉴于王氏家族为了保住自己的世官世禄，对于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替，一似与己无关，有的还参预其谋，所以各朝篡位者在禅代废立之时，无不借重王氏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凡主谋劝进，受禅奉玺者，莫不由王氏参与其事。如宋受晋禅，王弘、王昙首、王华（均为王导曾孙）皆为佐命元勋；南齐代宋，王俭、王晏（王导六世孙）均为谋首；肖梁代齐，亦由王亮、王志（均为王导六世孙）授玺。王僧兴为琅琊王氏的“僧”字辈，当为王导的五世孙。当肖衍进封梁公，为篡位紧锣密鼓作准备之时，为笼络王氏家族计，析晋安郡，别置梁安郡，授王僧兴梁安郡守，并与王亮、王志等同封“开国侯”也就不是偶然了。从此梁安郡亦与王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僧兴在梁安郡太守任内之事迹，史籍记载付诸阙如，无从考证；但是王方贲、王义童父子在开拓和发展海外交通方面却颇有贡献。

福建负山面海，港湾众多，人民善于造船，习于航海，自秦汉以来就与海外国家有着交通贸易关系。在福建诸港中以福州港的历史最为悠久，并在梁代之前为福建对外交通之唯一港口。据记载，三国时，“会稽东（冶）县人海行”，<sup>〔17〕</sup>梁朝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到国外。<sup>〔18〕</sup>东冶、晋安指的都是今福州一带，可见直至梁代之前，福建海外交通是以福州港为基地的，泉州港尚处于萌芽状态，未见于史籍记载。

自王方贲承袭父职，担任梁安郡太守，泉州港始崭露头角，王方贲“以惠和之德，有文武之才”，致力于开拓泉州的海外交通，亦有政绩。据说，真谛在建康时，遭侯景之乱，不能安居，辗转至晋安郡，旋因割据福州一带的陈宝应叛，“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在他“暂憩梁安”期间，得到王方贲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其中原因

除了王方贍“勤心正法，性爱大乘”之外，<sup>[19]</sup>恐怕更主要的是，他通过善待海外商客，以作招徕之计。在梁陈交替之际，整个江南动乱不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王方贍治下的泉州地区，不仅保持着安定的局面，而且经济、文化都有长足的进步，故能吸引来自远至印度的各国大舶。因此梁陈时，泉州港的开港与发展不能不首先归功于王方贍。

然而陈朝之后一直到唐末，泉州的海外交通又失于史籍记载，显然意味着泉州港的衰落，其中原因究竟何在？

原来，隋朝灭陈之后，为加强对江南地方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旨在抑制代表陈朝残余势力的江南仕族，地方豪强。据记载，当时“江表依内州责户籍”，刑法峻急，对地方豪强，“无所纵舍”以致江南仕族、豪强，人人怨恨，发动武装叛乱，<sup>[20]</sup>“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sup>[21]</sup>隋朝派遣大将杨素讨伐，其中浙江贼帅高智慧“船舰千艘”，被杨素击败，逃到闽越，依附王国庆，史书有如下记载：

“先是，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强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诸亡贼皆归之。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掩至，国庆遽遁，弃州而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乃密令人谓国庆曰：‘尔之罪状，计不容诛。唯斩送智慧，可以塞责’。国庆于是执送智慧，斩于泉州（今福州）。自余支党，悉来降附，江南大定”。<sup>[22]</sup>

王国庆是否属琅琊王氏家族，不得而知，但他为南安豪族，其势力坐大与长期担任南安郡太守的王方贍不能没有关系，起兵反隋或许是得到王方贍的暗中支持。所以隋朝经过激烈战争，讨平王国庆之后，为了摧制福建的仕族势力，除了裁并闽中郡县，废南安郡之外，还采取两项措施：1、将仕族的代表王氏家族徙居京兆，授王方贍“上仪同三司”，其品位虽然很高，却只是一种“散官”，“并不理事”。<sup>[23]</sup>2、“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sup>[24]</sup>杜禁私人泛海。隋初实行打击仕族势力的措施和对福、泉地方豪强进行严厉的镇压，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是完全必要的，但对福建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也产生不利的影响。直至唐初，情况依然是“户籍衰少，耘鋤所至，甫迹城邑，穷林巨洞，茂林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狼獾之墟”，<sup>[25]</sup>反映了当时福建的凋弊景况。隋初的战争主要在福州和泉州周围地区进行，福、泉所受的打击最甚，海外交通遂告中落。

王方贍之子王义童对发展海外交通也颇有建树。唐朝建立之后，仕族虽还有一定势力，但已不构成对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武德四年（621年），唐朝廷派王义童为江南道招讨使，率军入闽，利用琅琊王氏在福建的影响，一举传檄而定泉、建。唐遂置泉州都督府（治所在今福州），以王义童为泉州刺史兼都督。<sup>[26]</sup>

王义童在泉州都督任内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恢复和发展福建，尤其是福州的海外交通。史籍记载曰：“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变、细陵等，并授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并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式尖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

逆浪，都无畏惧，名了乌船”，<sup>[27]</sup>他们“往往走异域，称海商。”<sup>[28]</sup>所谓“泉郎”是卢循之遗种，当然是附会之说，实是一批世代以船为家，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沿海人民。王义童招抚泉郎，将这批人组织起来，从事海外贸易，使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所以《王义童神道碑》云：福州“境接东瓯，在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玢。”可以说，王义童的这些措施为唐代福州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sup>[29]</sup>

王义童后调任广州刺史，仍致力发展海外交通和贸易。关于他在广州的事迹，史籍语焉不详，但从《王义童神道碑》所载“知广州，清节酌贪泉于石门，合浦神君返明珠于涨海”来看，他在广州刺史任内，曾大力整顿吏治，招来外国商船，促进了广州的海外贸易的繁荣。

综上所述，王方贍、王义童父子是海外交通史上的杰出人物，值得研究。

[1]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

[2] 载《福建论坛》，1983年第4期。

[3] 杨炯：《盈川集》，卷7。

[4] 《梁书》，卷1，《武帝本纪》。

[5] 《梁书》，卷16，《王亮传》。

[6] 《梁书》，卷21，《王志传》。

[7] 《梁书》，卷1，《武帝本纪》。

[8] 《晋书》，卷98，《王敦传》。

[9] 《宋书》，卷42，《王弘传》。

[10] 《宋书》，卷63，《王昙首传》。

[11] 《宋书》，卷75，《王僧达传》。

[12] 《宋书》，卷71，《王僧绰传》。

[13] 《南齐书》，卷23，《王俭传》。

[14] 《南齐书》，卷33，《王虔传》。

[15] 《南齐书》，卷47，《王融传》。

[16] 《南齐书》，卷46，《王慈传》。

[17] 《三国志·吴书》，卷2，《孙权传》。

[18] 《梁书》，卷54，《扶桑传》。

[19] 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记。

[20] 《北史》，卷63，《苏绰子威传》。

[21] 《资治通鉴》，卷177。

[22] 《隋书》，卷48，《杨素传》。

[23] 《隋书》，卷28，《百官志》。

[24] 《隋书》，卷2，《高祖本纪》。

[25] 梁克家：《三山志》，卷33，《寺观类·僧寺》。（下转第37页）

外,考古发现的例子有:1982年于圣赫拿勒岛附打捞的“白狮”号(WITTE LEELIW)沉船,(沉没年代为1613年)以及前述的“圣迭戈”号沉船,都运载了成批的漳州窑瓷器。当然,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所运载的货物,或者是直接在我国东南沿海收购的,或者是经东南亚某地的转口贸易。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漳州窑瓷器从生产到销售,以及在消费地发现的简单情形和基本的历史面貌。在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期(大约为晚明至清初)的半个多世纪中,漳州窑瓷器曾大批销往东南亚地区。这一历史事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与联系。而通过对漳州窑瓷器这一外销瓷的特殊商品的深入研究,将为历史上我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体制、东西方交流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根源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与依据。但是由于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国外研究资料太少,尤其是作为外销瓷研究的诸多环节而言,来自消费地和消费者情况的资料很少,并且有些也仅是间接的资料,因此还难以复原漳州与东南亚关系的完整清晰的历史面目。而这正是今后中外学术界应给予关注的课题。

作者梁建安:福建省博物馆馆员(福州350001)

~~~~~

(上接第5页)

[26]《重修福建通志》,卷80,《唐职官》。

[27]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

[2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福建序》。

[29]关于唐代福州港的繁荣,参见拙文《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载《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

作者廖大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教授(厦门361005)